

张建业 许在全 主编

李贽研究

周谷城题



91

李 贄 研 究

泉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

主编 许在全 张建业

编委 许在全 张建业

苏双碧 庄炳章

陈清泉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 贇 研 究

泉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

主编：许在全 张建业

(北京永安路106号)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8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1—5000册 定价：4.50 元

统一书号：ISBN 7-80014-609-X/K·0019

目 录

序.....	傅家麟(1)
序.....	庄晏成(4)
李贽思想新探.....	苏双碧(6)
李贽思想体系.....	蔡尚思
——汉后一位反传统的伟大思想家.....	(23)
李贽与《九正易因》.....	张建业(30)
论李贽入世与出世思想的矛盾统一.....	李锦全(45)
从王阳明到李贽.....	李德永(58)
李贽经济思想初探.....	许在全(71)
挣不脱的魔力场.....	庄锡福
——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对李贽思想的制约.....	(77)
禅学与李贽的哲学.....	苏兰冈(91)
异端的权利.....	王永昆
——评我国古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李贽.....	(100)
李贽——中国古代异端文化的杰出代表.....	陈少钦(111)
李卓吾是先进史学思想家.....	庄为玠(119)
李贽的革新主张和卫道思想.....	林其泉(125)
试论李贽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黄高宪(136)
简论李贽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叶国庆 姜曾泉(144)
李贽的妇女观.....	陈桂炳(152)
李贽伦理思想述评.....	陈增辉(160)
试析李贽的道德观.....	钟庆梁 陈梦熊(174)
试论李贽的君臣观.....	谈文昌(182)
浅谈李贽的为政思想及其政绩.....	陈少牧(194)

李贽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陈遵沂(202)
对李贽思想问题的几点看法·····	林汀水(211)
李贽思想遗产的现实意义·····	林祖慰(223)
试论李贽的文学思想·····	黄拔荆(230)
李贽的创作观·····	王宾如(241)
论李贽的文艺观·····	施议对(253)
浅论李贽的审美观·····	沈继生(259)
李贽史学思想散论·····	罗仲辉(268)
从《批点皇明通纪》看李贽的政治主张·····	张志哲(286)
李贽《易因》与《九正易因》考述·····	张善文(295)
李贽与利玛窦·····	吴幼雄(306)
李贽非议“山人”与黄生其人·····	陈存广
——谈李贽思想研究中应该澄清的一个是非与 误解交叉问题·····	(313)
论李贽批评《水浒传》的两个问题·····	沈玉水(319)
李贽年谱考略序·····	黄寿祺(328)
李贽家世新考·····	陈泗东(330)
李贽家世考·····	林海权(340)
李贽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庄炳章(350)
编后记·····	(354)

序

傅家麟

在中国思想史上，李贽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偏居东南泉州的李贽，能够成为一位与众不同而又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呢？这不能不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去探索。自秦汉以后，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统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复杂的、多元的。既存在有封建制度，也存在有大量的奴隶制和村社制残余。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央政府的集权统治，不是一般人思索的那种水利工程国有的形态，也不存在土地国有制。而是中央专制政府通过科举、荐举、捐纳等，把各地方的权势者和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成两种体系，一个是公的体系，一个是私的体系。由此结合而成的中国封建制度，它既不象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典型的欧洲封建社会，也不象日本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它有严格的土地所有制，农民也带有相当严重的依附性。但它没有严格的庄园制度，没有等级森严的武士、骑士制度，没有不输不入的特权。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封建社会里，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始终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再加上奴隶制和村社制这两大残存物的作用，在地方上形成稳固的乡族势力和奴仆制度。从而加剧了这个社会制度的弹性和通融性，延缓了它的衰老过程。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出现过汉唐盛世，也出现过宋辽金元的经济繁荣，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其间，又经历了多次的农民战争。致使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还是处在长期迟滞的状态。

十六世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有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无疑有其内因和外因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从国内情况看，无论是平原山区、沿海内地，商品生产都有着空前的发展。而这时的泉州正处在中外贸易的中心，这里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越过其他地区。李贽的思想，便是在这种社会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他出身于伊斯兰系统的家族，这个家族很早就以从事海上贸易而闻名。在家族和周围环境的熏陶下，他的思想自然就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变化一样，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已经出现有一定的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和江南一带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思想界出现了左派王学，即泰州学派。我认为，这个学派正是中国市民阶层的一个代表力量，黄梨洲在《明儒学案》中说得好，泰派学派“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之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也。”这里所谓泰州学派以利欲鼓动得人，正说明他们已经冲破传统儒教的束缚，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要求。李贽的思想与泰州学派有着亲密的关系，他的主张比泰州学派更进一步，代表着某些新的生产因素，这些因素也就是中国目前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素。李贽主张“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这是前人从未说过的。他既是尊儒而又反儒，信佛而又反佛。他的信徒不但有儒家，也有佛家朋友如达观等人。他主张男女平等，公开反对社会上“以女人学道为见短”的偏见。他敢于冲破礼法的束缚，提倡“人”的价值，要求个性解放，认为“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种思想与晚明专制的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李贽

的这种叛逆思想受到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严厉压制，很难得到发展，但是它仍然对于晚明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象三袁兄弟的“清心”，所谓“中郎之论出，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灵，搜剔慧性”；还有汤显祖、冯梦龙、孙月峰等的戏曲小说，都在一定程度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和商品生产，在明代末期受到了农民战争的破坏，清兵入关又加重了对于城市经济的破坏，这样，晚明社会中的这些叛逆思想，也都纷纷中断夭折，得不到顺利的发展。尽管如此，李贽的思想不能在本国生根开花，却在外国或在数百年后的祖国起进步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得力于李氏思想的启发，在日本民主革命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我国“五·四”运动时期，吴虞也曾引用李贽的学说作为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李贽的思想应当值得我们重视，它不但在国内有地位，同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这是我对李贽思想的初步考察。去年十二月泉州召开李贽研究学术讨论会，意义重大。我因另有会议，未能出席。但看到会上许多论文，材料丰富，意见可取，很有启发。现在，会议组织者将论文编辑出版，承蒙不弃，嘱我为论文集写一个序言。我愧无以应，姑就近年来自己对李贽的一些看法，写了出来，代作序言，敬请方家教正。

1988. 4. 25

序

庄晏成

李贽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思想家，在哲学、史学、文学诸多方面都卓有建树，思想博大、精深、宏富。因此，开展对李贽的研究，探讨他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李贽的思想向来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邪说”。为了坚持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他一生遭受残酷的打击和排斥，其著作被禁止、被焚毁，其人被视为“妖人”，以至被追捕、下狱，并惨死于狱中。

可是，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却受到社会上广大人士的重视和赞颂。其书越禁越流行，越焚越增多，人人喜读、人人争读。焚书、读焚书的斗争，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演映出独特的奇观。

数百年来，思想学术界对李贽的研究连绵相续，从未间断，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历史、社会、政治及各人所持的观点不同，对李贽也毁誉不一，或诬为“妖人”，或誉为“完人”，使李贽形象蒙上一层阴影，至今犹未能对他作出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1987年12月16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是李贽诞辰460周年。福建省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市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为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李贽思

想，在李贽的故乡泉州，联合举办了李贽研究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专家、学者一百来人，济济一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交流了60多篇论文，从李贽的哲学、史学、文学、美学、宗教、家世、族性等等方面进行论述，各抒己见，既交流了观点，又交换了材料。涉及的范围有：如何评价李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李贽思想是否源于时代，高于时代；是否反孔、反封建；其哲学观的渊源和创新；其史学观的继承与发展，其文学观的实质及影响等等。根据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探讨研究，力求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评价，还其历史面目。同时，进一步发掘了新的史料，提出新的见解，抓住重点深入探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将李贽研究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贽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深入探讨李贽思想，必将进一步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同时，进一步看清他的时代局限性，扬弃其封建性糟粕。李贽极力主张人的“个性解放”，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作为是非”，具有反封建传统的战斗精神。通过对李贽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都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个良好的开端，但要正确评价李贽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还应全面深入的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从思想文化史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并联系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潮流等方面，进行纵横比较，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李贽研究》是全国李贽研究者的心血结晶，现在结集出版，这是一件好事，它将在深入探讨研究李贽思想总行程中立下一块新的路标。欣喜之余，作此为序，愿未来的李贽研究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李贽思想新探

苏双碧

李贽生于1527年，卒于1602年，福建泉州人，他因时因地用过许多别号，和家乡有关的，如温陵居士，广泛流传过的是卓吾，或称笃吾。李贽是十六世纪中国的重要思想家，学术界对李贽思想的评价历来有分歧。但大多对李贽思想具有进步性持肯定意见，而在李贽思想的属性上则有明显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他没有超越儒家的思想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是要作具体分析。在同一时代的学者当中，李贽是最勇敢、最进步的。他在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假道学的批判，颇为激烈，不但激怒了当朝，而且也激怒了当时的名儒学者，甚至当时的进步思想家，诸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都对李贽思想进行过口诛笔伐。设若李贽思想没有越出儒家的范围，那么，名儒学者为什么对李贽如此疾恶？另一方面，明王朝把李贽迫害致死了，李贽的书却越烧越多，越禁流传越广，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纪念李贽诞生460周年之时，对他的思想重新进行一些总结和评价，当是必要的。

一、高出于时代的思想特征

十六世纪的中国，在封建社会的胚胎里，已孕育出新的经济

因素，即在中国许多地区，许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李贽家乡所在的泉州是较早接受外国影响的城市，宋元时代，这里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之一，从阿拉伯来到泉州经商的商人络绎不绝。而阿拉伯是沟通中国和西方物质文明交流的中转站。由于阿拉伯商人大批涌入泉州，欧洲的文化也先后传到中国。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就曾经到过泉州，在他自己写的《马可波罗行记》中认为泉州（时称刺桐港）是“很大很繁荣”的港口。并说，泉州“这个商埠，商品、宝石、珍珠的贸易之盛，的确是可惊的。”另外一些到过泉州的外国人，也称泉州是“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伊本·巴都他游记》）。明中叶以后，泉州虽然因海禁而萧条过，但这时由于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中国沿海来经商的越来越多。尽管泉州逐步失去“世界大港”的地位，但和国外的交往却有增无减，据《明史》卷323所记，万历年间泉州人到南亚各国经商的经常达到“数万人”之多。《泉州府志》卷12也说：“频海之民，多以鱼盐为业，而射赢牟息，转贸四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此时“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

宋元以来，由于泉州成为同海外的交通要地，外国商人在泉州经商定居的也在所不少。因此，外国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都对泉州产生过影响。而李贽的祖辈曾以经商为业，到了李贽童年时代，尽管家道中落，其父林白斋（李贽原姓林）并不经商，但李贽族人仍有许多经商的。

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对于一部分思想敏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有可能出现新的跨越时代的思想火花，这种火花那怕是微弱的，但却是在对传统思想的一种冲击。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历来是重农抑商，李贽的许多言论却公开替商人说话，他在给焦弱侯的一封信中便说：“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焚书》卷二）并在另一篇文章中公开替“陶朱猗顿辈，

程郑卓王孙辈”等古代商人辩护。至于在他的著作中颂扬“市井小夫”的也在所不少。

更值得重视的，是李贽对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李贽所处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不管是朱熹的理学，还是王阳明的反理学学派，都是以孔子为旗帜，尊崇儒家学说的。孔学仍然是一切学说不可动摇的基础。李贽高于时人之处，是在于他有反潮流的精神，即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他曾经声明要与历史上“百千万人作对敌”，要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来批判封建理学。李贽公开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假道学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并且主张妇女和男人有同等地位，批判了儒家轻视妇女的思想。在《藏书》中他为许多历史人物翻了案。他的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既是时代驱使的产物，尤为时代所不能容许。明王朝以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论李贽罪，具体罪名是“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神宗实录》卷369）并以此为理由，将李贽逮捕入狱，迫害致死。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诸如“肆行不简”，“勾引士人妻女”、“挟妓女，白昼同浴”等等耸人听闻的罪名，当然尽是诬陷不当之词。李贽的朋友马经纶当时就致书一一驳斥，指出纯属欲加其罪，而非李贽之所为。马经纶以李贽的为人、处世、德望，指出“彼盖借宣淫之名，以丑诋其一乡显贵之族，又借逐僧毁寺之名，以实其宣淫之事。于是贿众狂吠，若以为公论公恶焉耳。此其机械诚深，而其用心亦太劳矣。”（《与当道书》）力证李贽决不“宣淫”，决非“惑世”。然而，当朝置李贽于死地，并非所谓“宣淫”之罪。而是因为李贽“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明神宗批准逮捕李贽时所宣示的罪名，也只是

“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消除李贽的影响，明神宗下令“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明神宗万历实录》卷369）当朝害怕的是李贽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即对假道学的批判，对孔子的抨击和非议。在封建的卫道者看来，李贽的这些主张，已经触及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这才是李贽在麻城被逐、北京被捕入狱的真正原因。

中国在经历过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之后，封建专制主义十分牢固，孔子思想在不断被变换（至少有董仲舒的孔子、韩愈的孔子和朱熹的孔子等等）之后，成了封建社会绝对神圣的思想绳索，谁要触及到孔子，谁就是叛逆，谁就要受到社会的惩罚。李贽在批判假道学的同时，把矛头指向孔子，指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在《藏书》中的《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声称“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并且指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的颠倒历史是非有过一段颇具气魄的自白，他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的以为可託国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焚书》卷6）李贽看到真正的历史被歪曲，不少历史上的伟人因受传统观念束缚而蒙冤受屈。所以，他才产生要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愿望。抱着这样的目的，他重新审查历史，即“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续焚书》卷1）李贽的这些无畏勇敢的精神，虽然包含着许多主观唯心主义的成份，这是历史对他的局限，他还找不到先进的批判武器。但是，仅就他敢于触动孔子的权威，敢于翻封建传统历史的案，他就不但颇具气魄，而且突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体系，宣传了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这是当代思想家所不可能攀比的。历史证明，在李贽之后，凡是想突破封建思想体系的，都必然要冲击儒家学说，也都必然要非难孔子思想。从这一

点说，也证明李贽思想确实包含有新的因素，即本国在缓慢发展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的文化对中国局部地区所发生的冲击作用，这两种力量在当时还不足以对抗传统的封建主义势力，只有在个别敏锐的知识分子当中，才会产生向封建传统势力冲击的思想。李贽的思想源于时代，却高出时代，他对旧的传统势力采取一概怀疑的态度，发出要颠倒传统历史的呼声，这不是一般儒家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

但是，李贽本人在被捕之后，回答当局讯问时曾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马经纶在《与当道书》中替李贽辩护时也说李贽是“乐圣人之道，诠圣人之经，若世所梓行《易因》及《道古录》诸书，真上足以阐羲、文、孔、孟之心传，下足以绍周、邵、陈、王之嫡统。”因此，不少论者以此为据，认为李贽并没有反封建思想，或认为李贽的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是代表地主阶级不当权的一派。无疑，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笼统地这样说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李贽说他自己的书于“圣教”有益无损，但这个“圣教”是李贽的“圣教”，即经过李贽改造过的“圣教”，即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论”一样，是康有为的“孔子”，而不是历史上的“孔子”。很明显，尽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反礼教的斗争，但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进行非孔，更没有把妇女提到同男子平等的地位上来，至于颠倒传统历史更是谈不上。可见李贽思想确实为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思想因素。事实上，与李贽同时期或李贽稍后的一些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亭林、王夫之等人，也曾激烈地反对专制君权。但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儒生，即忠诚的孔孟之徒。因此，这帮人对李贽的思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们非常自觉地和李贽保持距离。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唯李贽一案不立，而且在《明儒学案》卷首的《师说》中，说李贽是“小人之无忌惮”。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则认为“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中更指责李贽“书皆悖乖谬，非圣无法”，“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污简牍。”简直是咬牙切齿。明清之际的这些大家，对何心隐的所谓“叛道”被杀，还多能表示同情，而对李贽则几乎都群起而攻之。说明何心隐的思想主张并没有越出封建传统之道，而李贽则不同。在他们看来，李贽才是封建传统的真正“叛逆”。甚至，就连声名很大的东林党人顾宪成之辈，也对李贽多加讥讪，不怀善意。显然，李贽在地主阶级的正统观念中不论在朝派还是在野派都得不到支持。而是在一般士大夫中，或受李贽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之中，李贽的言论是有市场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不得不承认“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傅维麟在《明书·李贽传》中说，皇帝下令焚烧李贽的书时，士大夫中则“家藏户守”，并自此之后“士风大都由其染化，亦孔子之道一大厄也。”可知当时的儒生还是把李贽的思想看成对孔子的威胁，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成了孔子的“大厄”。李贽思想和封建传统思想是有所区别的。

二、在批判假道学中宣扬平等思想

李贽曾经激烈地批判过假道学，并在批判中阐明他的平等思想。他批判假道学是在天窝书院开始的。李贽在辞去姚安知府之后，曾寄居在湖北好友黄安耿定理家。辞官不回籍，据李贽自己说是因为“平生不爱属人管”，因为“弃官回家”得属本府本县的父母官管，所以宁可“飘流四外，不归家”，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因他和耿定理相处甚善，把耿看成是自己的“胜友”，可以“终日晤言”，即为至快，这自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李贽想寻找个可以研究学问，探讨历史、探讨社会的环境，

而耿定理家有大量书籍，又是文人学者荟萃之地，自然是个理想的环境。

李贽刚来黄安时，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对李贽是友好的，耿定向为李贽“筑室天窝，甚整。”李贽曾对执友焦竑赞誉过耿定向的相助。天窝是指天窝书院，何心隐、罗汝芳、焦竑等曾在这里讲过学，使天窝书院颇具声名。李贽在天窝书院潜心读书、著书，把他原来已有的反传统思想加以条理化、理论化。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李贽在天窝书院博览众书，“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曲。”等等都涉猎其中，并且各都批阅，“雪藤丹笔，逐字雕校，肌理分，时出新意。”（《珂雪斋近集文钞》）因为是带着向传统观念挑战读书的，自然时有新意。在《解老》中，李贽驳斥了“圣人仁万民”的说法，指出“使圣人而能仁万民，则圣人将谁与仁？”李贽对儒家宣传的所谓“天生圣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致一之理，蔗人非下，侯王非高，在蔗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在李贽看来天子和蔗人是一样的，不应有贵贱之分。这对儒家卑尊有序，君子小人有严格的鸿沟，当然是有力的挑战。李贽在从事颠倒历史之际，其矛头同时也对着孔子和儒家。耿定向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是尊崇孔孟之道的。李贽多次对孔子之道进行激烈批评，自然要触犯耿定向的。学术上的分歧，逐步导致政治上和感情上的分歧。据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一次，李贽在和耿定理、周思久论学，观点便有明显不同：“一日论学，柳塘谓：‘天台（耿定向）重名教，卓吾识真机’，楚倥（即耿定理）诮柳塘曰：‘拆篱放犬。’耿定向要严守名教，而李贽则想摆脱名教的束缚，思想明显对立。耿定理的“拆篱放犬”自然是支持李贽的。李贽之所以能在黄安住下来，完全是因为有耿定理的支持和观点的相近。耿定理死后，李贽和耿定向的公开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

耿定向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尊奉孔子礼教，认为孔孟之道